

□ 回忆录

担心资源短缺而导致社会冲突，和平地共同享受更高的物质水平。

在50余年科研和创业的漫长岁月里，我有两个座右铭。一个就是马克思讲的，“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，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，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。”另外一个就是苏联的生物学家巴甫洛夫讲的，“科学需要一个人贡献毕生的精力，假定每个人有两次生命，

这对你们来说也是不够的。”我自己是按照这两个座右铭走过60年，愈走体会愈深，终于“合二为一”，原来讲的是同一真理：一山还比一山高，需要一代代人前仆后继，切莫过早地自以为到达了光辉的顶点。我们的第二次生命在哪里？就在我们一代一代的新人身上。

（摘编自《清华记忆》，清华大学出版社，2011年，郑小惠、童庆钧、高瑄编著）

过往征程 铭刻于心

○傅 珺（1950届外文）

“十八罗汉”闯关东

1949年初，北平刚刚和平解放，东北军工部孔希同志找到潘梁。孔希是潘梁的妹夫，潘梁则是清华地下党原负责人之一，当时已调至北京团市委筹备委员会。孔希说东北急需技术人才，组织上要他找些清华同学去东北。

潘梁找到张炳萱（地下党员）要他去动员，张炳萱串连了18位同学，现在记起来的有：航空系张炳萱、蔡奇图、周钦、

顾胜良；机械系徐应潮、吴佑福、冯登泰、王提涛、朱荣超、苏世范、唐突；电机系顾慧、唐道周；化学系吴庆云；外文系傅珺。

1949年2月28日，我们18人随孔希同志坐火车去了沈阳。后来我们被同学们戏称为“十八罗汉闯关东”，但只有一位“女罗汉”，就是我。

我们到沈阳后，东北军工部何长工部长很爱护清华学生，在培训期间，他腿不好，还拄着拐杖亲自带我们下工厂参观，到沈阳51厂和52厂。何部长说：“你们要向工人阶级学习，知识青年要和工农群众相结合才有出路，要不就是墙头草，随风倒，扎不下根。”下厂回来，他又请“中国的保尔·柯察金”吴运铎同志给我们做报告。吴运铎人很瘦，穿了一身旧军装，戴着墨镜，他给我们讲了自己是怎么在党的培养下奋斗过来的。他说：自己虽然负伤，眼睛看不见了，可是还有双手，还可以为党和人



奔赴东北工作的部分同学参加顾胜良同学婚礼时合影。前排左起：徐应潮、傅珺、顾胜良（左4）夫妇、苏世范（右2）夫妇；后排左起：张炳萱、朱荣超、周钦、顾慧、冯登泰、蔡奇图、□□□、吴庆云、唐道周

民、为解放军做很多工作，要把自己的一生都贡献给共产主义这个人类最壮丽的事业。他的报告使我们很受教育，会后讨论时大家纷纷表态，一定要向吴运铎同志学习，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。我们的培训大约两个星期结束，然后就分配工作。

当时，领导让我先到一个技术图书室去工作。其余的机械系的去设计室设计枪炮，化学系的到火药室制造火药，电机系的去了哈尔滨电工系统。

最初，我们所在各单位都属于东北军工部的技术处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中央成立了许多军工研究、生产部门和军工院校，大家都分散调到了各部门：张炳萱去了北京航空学院；顾胜良去了南京航空学院；蔡奇图和苏世范去了船舶工程公司；吴佑福因为会说广东话，很快调他随四野南下解放广东、海南岛，后留在海南铁矿；我和应潮辗转调到航空工业部。

我开始去的东北军工部第三研究所（即火药炸药研究所）在沈阳，我在技术图书室工作。那时的图书室存放着一大堆技术书籍，没有整理，各种书籍中有日文、英文和德文的，其中日文书籍最多，而中文书籍则很少。还有俄文技术书籍，阅读困难时好在有字典可用。

起初，我请领导买了一本图书分类法的书。还在清华大学时，我曾经在图书馆工作过，有些经验。我和另外两位女同志一起把技术图书馆所有书籍整理好，分门别类地放在书架上，给每本书都贴上标签。还将编好的书号贴在纸口袋上，把借阅卡片放进去。我们还印了一些借书证，发给研究室的同志，他们就可以借书了。记得1949年的“五一”劳动节，图书室获得集体二等奖，是一面大红锦旗，我们三

位女同志都特别高兴。

1951年开展“三反”运动（即反贪污、反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），我从技术图书室调出来搞运动，负责整理材料和搞外调。

秘书生涯

1952年底“三反”运动结束后，我被调去研究所所长办公室，给所长当秘书。此后七年多时间里，我又受到老一辈革命知识分子的培养和影响。

我的第一个领导是肖淦。他是“一二·九”时期从上海交大去延安，由延安自然科学学院到东北军工部技术处，后来任第三研究所所长。他待人和气，说话声音总是很低，从来没有听他大声喊过。他注重职工队伍建设，每个月都要给党员上党课，给团员上团课，给工会会员讲课。

那时我们每天晚上都有业余学习，晚饭后上课。我还给不识字的工人师傅们扫盲，有时自己也去上课，学习有机化学，由所里的工程师、技术员讲课。徐应潮和另外一位同学被派去跟随苏联专家学习。那时肖所长给他们写了一封信，让他们主要学习专家的技术经验，不要学他们的生活作风。

我觉得肖所长不光是对别人严格，对自己也很严格，以身作则。他虽然严格，但批评人时是以理服人，耐心说服。

记得有一次肖所长带我出差，从沈阳去西安要经过北京，那时我爱人徐应潮已调到北京第四研究所工作。我们到北京后当天晚上，肖所长让我去四所看望徐应潮。我自己一个人去四所，从颐和园乘坐46路公交车到红山口下车，在解放军医院门口给四所打电话找应潮。那时他正在灯

□ 回忆录

光球场打球，听到广播接了电话，找了辆车接到我。那天我们在招待所住了一夜。第二天一早我返回城里，跟肖所长一起去西安。

从西安出差回来不久，第四研究所来了调令，我就离开三所，到北京第四研究所所长办公室给高所长和陈克书记当秘书。

第四研究所是搞火炮、弹药研究的，也是保密单位，所的规模要比三所大多了。每天早晨上班时，所长、副所长和各研究室、车间、科室领导干部开会，布置一天工作。开会时领导讲话，大家都在保密本上记笔记。每天下午下班时间，都把保密本统一收上来，交到保密室锁起来。第二天早上我再去保密室拿出来分还给各位中层领导。那时所长是高霨亭，副所长有洪明光、蔡克非、余琢之、陈根丰，党委书记是陈克。“运动”来了，先是“插红旗、拔白旗”，后来是“梳辫子”。“拔白旗”时是应潮挨批，说他是“青年中的一杆大白旗，要坚决拔掉”。

记得在应潮挨批前一两天，所里中层干部去部里开会时，他还受到部里的表扬。当时教育科丁克中从部里开会回来，对我笑笑，说了应潮受表扬的事。后来我才知道应潮在“大跃进”时期，曾设计了一台小型精密磨床，为此获得了国家计委发明创造乙等奖。他设计的磨床由天津磨床厂生产，还销往海外。几年后，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他们研究室集体搞的一项科研成果也得过奖。

运动中，我们搞不清楚，也不知道问谁，每天就是看看大字报。后来，我不在办公室工作了，要整改，把我和蔡克非的爱人调到幼儿园去搞整改。去的时间不长，好像运动也结束了。随后第四研究所

就分所了，四所一室搬到车道沟，归属第五机械工业部。我被分在新成立的第六研究所办公室继续做所长秘书。六所是苏联援助建设的156个项目之一，是航空材料研究所，对应苏联的全苏航空材料研究院。当时来了很多苏联专家，所里有27个研究室，基本上每个研究室都有苏联专家。所里成立了专家工作组，我就转去做专家工作了。那时专家办公室有两个同志，一个是俄文翻译郭泽佩同志，再一个就是我。老郭是苏联专家组组长格吉兹杨的翻译，这位专家是耐热合金专家，六所1室负责研究耐热合金。

我的工作就是负责贯彻执行苏联专家的建议，然后每星期到部里的专家工作办公室栗阳同志那里汇报。记得有一年的“三八”妇女节，北京开了一个专家招待会，所里的专家全都出席了，翻译同志们也去了。我没有去，把票给了另一位翻译同事。她们回来告诉我，那天晚上周总理出席了，她们都见到总理了。

不久，中苏关系破裂，苏联专家们就撤走了，连资料、样品都带走了。

向技术翻译转型

1966年邢台大地震，震区好多人都失去了手和脚，需要人工关节，六所18室是研究钛合金的，他们就做了一些人工关节，给地震受伤的人试用，效果不错。于是六所18室就做钛合金的人工关节，还推广到全国。

这段时间，没有了苏联专家和苏联资料，毛主席号召“自力更生，艰苦奋斗”。六所的科研继续，我们开始从英、美的技术资料中找参考。那时所里的科研技术人员大多不会英文，六所是苏联援助

建设的，好多技术骨干都是留苏学生，他们懂俄文，但是不懂英文，所里就让我来教英文。每天早上7点上班，我先给研究室的主任们上课，主要教语法。晚上再给科研课题负责人上课，也是教语法。我还用“灵格风”的一套英文教学唱片来做教学资料，这样边教边学我自己的英文水平也有了提高，就是有点太忙太累。

没过多久，我们就开展技术座谈，与英、美、德、法等国家的有关专业专家们举行技术座谈，还是我去做翻译。当时我在22研究室负责科技信息情报的收集整理，被领导分在金属专业组，负责耐热合金专业。因为我没有这方面的知识积累，有时就去1室，看他们做实验，有时就跟他们一起炼钢，确实挺有意思。我参加过25室的高低温疲劳试验技术座谈，但有一次参与同美国的胶接技术座谈，涉及非金属专业，我因为技术外行一点都不懂，只好临阵磨枪，抓紧背相关技术名词。那次我们参谈小组住在城里航空工业部的招待所，每天晚上我们集体讨论白天老外讲的资料，有不懂的地方就提出来，准备会面时再问。一天，和老外座谈并一起吃晚饭，主谈的外宾喜欢喝酒，我担心他喝多了，就提醒他少喝酒。因此，那位外宾就叫我“小妈妈”，我的同事就说，我得了个“干儿子”。

那段时间，我参与接待了好几个国家的技术专家，主要是金属专业的。后来航空工业部调我去北京航空学院和一位英国专家夫人Mrs. Carrot一起教英文，她是英国Rolls Royce公司派来的代表，我教口语，专家夫人教阅读。每天早上我先去北京饭店等专家夫人，然后一起坐车去北航上课。下课后又一起坐车回北京饭店，我

再坐公交车回住处。

北航教完书后，我就借调到部里进口处做翻译。原来进口处有一个翻译，但是实际上不会英文。我去后就是做英文翻译，处理每天来往的文件、传真等，给不会英文的项目经理们当“拐棍”。那时，应潮已经调到航空工业部外事局（后改为“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”，简称“中航技”）。我借调到部里工作了整整10年，因为六所不同意我正式调动，但是实际工作已经与研究所无关了。

1988年春节前，部里让我出差英国，原计划给一个“机载设备局”的索赔小组做翻译。事后我才知道，那次出国是瑞典的Jourgh Quike公司请徐应潮当顾问，应潮帮助瑞典公司把英国发明组合夹具的老牌公司打败了，瑞典产品占领了英国三分之二以上的市场，瑞典公司还因此获得英国女王伊丽莎白颁发的“最佳夹具销售商”奖状。瑞典驻英使馆为此召开一个晚宴来庆祝，邀请我们夫妇出席，所以这家公司就发正式请柬并附上往返机票。航空部利用机会，让我做翻译还省了一份往返机票钱。

陪应潮转战欧洲

那次出国，我先给“机载设备局”的小组做翻译，参与索赔谈判。中方认为外方“卢卡斯”公司出口的机载设备有问题，外方却觉得是中方操作不当。为验证问题要各自操作一遍，找出问题，明确责任。索赔谈判的工作还没完，我就被调到另外一个小组去，给“量具修理”小组做翻译。这个小组的翻译工作比较轻松，中午在公司吃午饭，早晚在驻地自己做饭吃。那时我们小组住在英国的一个

□ 回忆录

小城市Eastleigh，房东去非洲后托人出租房子，我们离开旅馆住进那栋房子。那是一幢两层楼房，还有一个阁楼。我们小组3个人，每个人都有两间房。白天我们去Drapper公司工作。每个星期我都去一趟中航技驻英代表处，领取小组3人一个星期的生活费。晚上，下班回来我就听听音乐，小组的江师傅和小陈看电视。

那段时间，应潮仍然在瑞典公司当顾问，有一个偶然的的机会，他知道这家公司的一位销售经理要参加一个关于“柔性制造”的国际会议，想介绍中国的组合夹具。应潮觉得中国的组合夹具应该由中国人来介绍，便在国际会议组委会截止收取论文前一天，赶写了两篇相关论文。应潮来到我们驻地，让我帮他打印并对论文文字做些完善。那天我们两人整整忙了一个上午，把他的两篇论文打印出来交到国际会议组委会。后来应潮的两篇论文都被选中，刊登在国际会议特刊上。会后组委会送给应潮两本会议特刊，其中一本是精装版。应潮回国后，把这本精装的特刊送给清华机械系了。

借调航空部工作期间，记得有一年，



1986年5月，徐应潮、傅珺夫妇在英国Eistleigh驻地院内留影

肖所长出差北京。那天我去招待所探望肖所长，并陪他到六所看望从三所调来的老同志们。我们只能坐公交，到了所里后，我想请肖所长去杨大烁家，又把杨学恒找来，接着找魏所长（他和肖所长在延安时就认识）。老同志们在一起，很高兴地聊天。在返回城里的路上，肖所长告诉我，“文革”中他的肋骨被红卫兵打断了7根，还罚跪了很长时间。自那次以后，我再也没有见过肖所长，若干年后才知道肖所长已经离开人世了。

我离开中航技后，最初和应潮一起去德国汉堡乐嘉文公司（Recherman Ltd.）建立起一个合作经营部，中方提供出口产品组合夹具，外方出办公地点，中方工作人员的工资中方支付，出差费用由德方支付，产品销售后的收入两家平分。这样我们就在德国汉堡住下来了，中方3个人，应潮是负责人，也就是这个部门的经理；我是翻译，542厂的宋师傅负责组装。

刚开始时，组合夹具没有销量，宋师傅无事可做。好在不久应潮把组合夹具推销到了意大利一家公司，宋师傅就和我出差去意大利。宋师傅教外方如何使用组合夹具，我做翻译。那时我不会意大利文，德文也不太会，只能用英文。可是意大利人的英文也不太好，没有办法，我买了一本英文、德文和意大利文的小字典来帮忙，好不容易总算完成了任务。我们在意大利一个星期就把工作做完了。回德国后，宋师傅不习惯在国外生活，眼睛又疼，他要回国。于是应潮跟542厂赵厂长联系，把宋师傅调回了国内，换来了黄国桢副总工程师。黄总来后，我们一起出差过瑞士3次、瑞典4次、意大利好几次。最后，应潮和意大利的Mr.Jelardi合作得很

好，除了销售组合夹具，后来还销售组合平口钳。组合平口钳原本是意大利的产品，经过应潮和Jelardi改进后，由542厂生产再外销。由于市场打开，中国产品销售扩大，德国的乐嘉文公司老板和意大利对合作经营都非常满意，大家的辛苦没有白费，实现了合作共赢。

坎坷但愉悦的晚年

1997年11月29日，应潮上午去医务室量血压，大夫发现他血压太高，建议他赶快回家睡觉。可他睡不着，脑子想工作停不下来。他觉得如果去游泳，活动累了，可能就能睡着了。下午，他去了英东游泳馆游泳，谁知天气太冷，一下水刚游100米就头晕、呕吐，泳池急救员看到后急忙下水把他扶上岸，他说了家里电话号码和去安贞医院，人就陷入了昏迷。

那天下午大约4点多，我接到英东游泳馆电话，得知应潮已在安贞医院抢救。我和儿子傅强赶忙坐公交车赶到安贞医院，那时应潮的瞳孔已经开始放大。我说赶紧给刘力生大夫（应潮南开中学的同学，后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血压联盟主席）打电话。费尽周折给刘力生打通电话，他马上又与老友洪昭光大夫通话，商定要赶紧给应潮做CT判断病情。但那时安贞医院的CT坏了，洪大夫马上给朝阳医院的两位院长写了一封信，我们立即用急救车送应潮到了朝阳医院。经CT检查确诊应潮是小脑出血，并因瘀血压迫导致颅压升高昏迷。第二天早上，大夫告诉我：“抢救要在头部钻孔引流，降低颅压，但对大脑的伤害比较小。”我同意后手术顺利进行，随之应潮就转到了新建的ICU病房。



清华老同学聚会。前排左起：吴宏宛、贺文贞、彭珮云、汪家镛、傅珺，后排左起：钮友杰、黄庆华、张其锬、王浒

三个月后，应潮又转到朝阳医院脑外科病房，做高压氧治疗。那时“皮球”（陈莹，原名吴勤娟，清华校友）每天早早就来到病房，帮着我把应潮推到高压氧仓去做治疗，然后再推回病房。那段时间，徐绍仪大夫还每天请北医康复科的一位护士下班后来给应潮按摩。

1998年5月1日，应潮顺利转到中日友好医院，住进了一个单间病房。经过一段治疗后病情稳定，应潮就出院了。

从病倒到去世的17年零4个月中，应潮因病情反复多次住院、出院。我们要感谢清华校友们的无私帮助和关爱。应潮患病后，不能自主行走，说话也有障碍，主要在家里调养。找一位有经验又尽责的护工十分重要，赵葆元和陈伯时真是帮了大忙。赵葆元得知亲戚家有位保姆张小霞，有护理瘫痪老人的经验，就千方百计动员她来我家。对此他亲戚很不满意，骂得赵葆元狗血喷头，他也不在乎。小霞来后细心照料，节假日都很少休息。后来赵葆元得了胰腺癌，他去世前两天，小霞代表应潮和我去医院看望赵葆元，他说：“有你

□ 回忆录

照顾应潮，我就放心了。”

应潮始终顽强不屈地和病痛作斗争，开始说话不清，他就练习唱歌，努力一字一句地说话，最后终于又可以和校友们交谈了。他还用那个可以活动的手使用电脑，敲键盘写文章。过去他是老同学合唱团的朗诵主力，现在不能上台朗诵了，但逢年过节合唱团有活动时，他用电脑写朗诵诗，请别的校友朗诵，有时还坐着轮椅上台。有一次参加清华研究生毕业大会，请校友朗诵他的诗，他上台陪着，极大地感动和教育了在座的年轻校友。

那段时间，清华解放战争时期的老校友常有聚会，应潮总是坐轮椅参加。以“松明团契”为主的老同学们每年至少有一两次在我家聚会，平时也常有校友来家和应潮聊天，大家谈天说地，忆往论今，并在电脑上交换讯息，应潮一点也不寂

寞，也不闭塞。

2015年3月5日，和我相伴60年的应潮安详地走了。老同学们特意在我家开了个追思会。大家深情地回忆和应潮的交往，对他乐观坚强面对困难、深情地热爱祖国、热爱人民、热爱母校的精神深为钦佩。我现在还常常聆听追思会的录音，可惜有好几位老同学已去见应潮了。

要感谢的老同学太多了，还没有来得及好好谢他们，一个个不是走了就是病了。趁我的脑子还不糊涂，我想赶快写完，否则就来不及了。最后希望大家多多保重，心情愉快，身体健康。清华老同学们的友谊地久天长！

我们庆幸曾经是这个学校的学生，愿清华永远青春勃发，一代更比一代强，为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世界努力学习，奋斗终生。

读者·编者

2020年11月7日，本刊复刊40周年纪念座谈会举行，之后陆续收到不少校友、读者的来信，对办刊工作提出了诸多建议和良好祝愿：

张其锬（1950届土木）：《通讯》复刊40周年纪念座谈会召开的新闻报道写得很精彩，既报道了《通讯》的发展历史，又报道了她的定位、作用和未来。感谢历届编辑人员的辛勤劳动！

田芊（1970届精仪）：座谈会开得很好。《通讯》是校史的记录，是传统的载体，是校友的纽带。编辑们很辛苦，是勤勉工作的无名英雄。

吴竹涟（1966届建筑）：作为老校友、校友总会老理事，为《通讯》复刊

40年取得的成绩感到高兴。每次收到《通讯》都急不可耐地翻阅，她以跨越时空的方式，将我们与母校、校友与校友联系起来，未行万里路，而知天下事。40而不惑，愿她越办越好！

赵国际（1989级研，核研院）：《通讯》办得好，每一期我都留存，有空仔细阅读，给人以鼓舞和激励！

戴美政（联大史研究学者）：83期封面设计新颖、典雅、美观，新鲜气息扑面而来，此创意太好了！

龙美光（联大史研究学者）：《通讯》也是联大历史文化和联大精神的传承阵地，北大、清华、南开、云南师大四家，论校友和校史工作，清华一直是领头雁。